

詳註周美成詞片玉集卷之一

繆鉞

合撰

葉嘉瑩

廬陵陳

元龍少章集註

建安蔡

慶之宗甫校正

春景

瑞龍吟

大石

揮犀云：廬藏用夜間龍吟聽其聲清越乃真瑞龍吟也。

章臺路

史記秦昭王作臺於咸陽漢書張敞走馬章臺街下即路也。

還是

褪粉梅梢試花挑樹悄悄陌人家定巢燕

子歸來舊處

柳惲詩：玉堂夜悄悄杜鰲疑竚詩：頻來燕語定新巢。

因念箇人癡小下窺門也。蘇子常云：窺小

靈谿詞說



靈
谿
詞
說

繆 鉞
葉嘉瑩
合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責任編輯 沈善鈞
封面設計 胡光武

靈 谿 詞 說

繆 鉞 合撰
葉嘉瑩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華書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9.5 字數 425,000

插頁：(平)2 (精)5

1987 年 11 月第 1 版 198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平)3,000 (精)1,500

統一書號：10186·747 定價：(平裝)7.50元
(精裝)8.80元

本書的撰寫，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加拿大社會人文科學研究理事會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 的大力支持與贊助，列爲中、加文化交流科研項目之一。在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六年的暑假期中，中、加兩方共出經費，資助葉嘉瑩來華，到成都留居，每次約兩個月左右，與繆鉞共同撰寫《靈谿詞說》，商擬計劃，研討文稿。當此書完稿付印之時，我們謹向中、加兩方科研領導機構表示懇切深摯的感謝之意。

繆 鉞

葉嘉瑩

同啓

一九八六年六月

前言

葉嘉瑩

——談撰寫此書的動機、體例以及論詞絕句、詞話、詞論諸體之得失

一

《靈谿詞說》是四川大學歷史系前輩學人繆彥威教授（鉞）與我正在合作共同撰寫的一本論詞的書。這本書的寫作，對我而言，有兩點極可紀念的意義：其一是遇合之可貴；其二是體例之創新。

先就遇合之可貴而言。我對繆先生之欽仰，蓋始於三十年前初讀其著作《詩詞散論》之時。我自幼即耽讀古典詩詞，此雖由家庭環境之薰習，然亦出於一己之天性。當時每讀歷代詩詞之名篇佳什，總常常會引起我心中一種感發不能自己之情，而又苦於學識之淺薄幼稚，雖恍然若有所得，而未嘗能自言其所得。昔《秦風·蒹葭》之詩，有「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之句，我想這就是當年我在閱讀古典詩詞時，中心所常具有的一種感受。在這種渺茫的嚮往追尋之中，前後

曾經有兩本評賞詩詞的書，分別給了我很大的啓發和感動：一本是王靜安先生的《人間詞話》，另一本就是繆先生的《詩詞散論》。這兩本書的性質，其實並不完全相同。我之閱讀《人間詞話》，蓋始於我還在讀書的髫齡時代，而我之閱讀《詩詞散論》，則已在我大學畢業開始教書之後。《人間詞話》是我在學習評賞古典詩詞的途徑中，爲我開啓門戶的一把鎖鑰；而《詩詞散論》則是在我已經逐漸養成了一己評賞之能力以後使我能獲得更多之靈感與共鳴的一種光照。《人間詞話》所標舉者，是評賞詩詞之際，所當體悟的一些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衡量及辨析的準則；而《詩詞散論》則是對個別的不同體製之韻文與不同風格之作者，在本質方面的精微的探討。二書之性質既不盡同，我在閱讀二書時之所得也並不盡同。不過在我的感受之中，這一本書却也有着一些根本上的相似之處，其中最值得稱述的一點，就是此二書之作者之所敘寫的，都是他們在多年閱讀和寫作之體驗以後的所謂「深得甘苦，愜心貴當」之言，這與一般作者之但以徵引成說或誇陳理論爲自得的作品，是有很大不同的。再則，此二書之作者，似乎都各自具有一種靈思睿感，正如繆先生在其《王靜安與叔本華》一文中所說的，「其心中如具靈光，各種學術經此靈光所照，即生異彩」。這正是此二書之所以能使讀者

在閱讀時，往往得到極大之感悟和啓發的主要緣故。而更可注意的一點則是此二書之作者在心靈感受方面，似乎原來便有着某些相近之處，古人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以《詩詞散論》之作者，在其論王靜安之文中，乃能獨具深悟，且於篇末對靜安先生之自沉深致歎惋。我個人既然自早歲即

耽讀靜安先生之著作，是以在閱讀繆先生《詩詞散論》之時，乃亦不免常有一種「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所戚戚焉」之感。其後在七十年代初期，當我在美國哈佛大學撰寫《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一書之時，遂亦每每引用《詩詞散論》中論王靜安之語，而我對於此二書之作者，亦更增加了一份欽仰景慕之心。不過自古以來，因讀其書而慕想其人的讀者，常未必都有能與其所慕想之作者相逢一晤的機緣。昔杜甫之於宋玉，就曾有過「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的悲慨；辛稼軒崇愛陶淵明，在其一首《水龍吟》詞中，曾寫有「老來曾識淵明，夢中一見參差是」的想像，又在其一首《賀新郎》詞中，曾寫有「想淵明、《停雲》詩就，此時風味」的句子；然而就在同一首詞的後面，稼軒所寫却也是「回首叫、雲飛風起。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的悲慨。至於我所欽慕的二位作者，則《人間詞話》之作者既早已成爲古人，而經過多年動亂之後，我對於《詩詞散論》之作者，也早已不敢抱有冀能一見之想。但誰知就在我並不敢抱有一見之想的情況中，却意外幸運地與《詩詞散論》的作者不僅得到了相識見面的機會，而且蒙受到極深重的知賞，更進而能開始了共同撰寫論詞專著《靈谿詞說》的合作，這對我而言，當然是極可寶貴的一種遇合。

這次遇合是發生於一九八一年四月，在成都杜甫草堂所舉行的杜甫學會第一屆年會期間。當時有人曾經把我所寫的一篇論杜甫七律的文稿提交給了杜甫學會年會，而當我接到通知信件時，距

離開會的日期已經很近，我任教的加拿大的大學，正當學期將近結束之際，本來不易抽暇前來開會，但因為杜甫原是我平日非常崇拜的一位詩人，而且我以前還曾經講授過杜甫詩專書的課程，何況開會的地點又是在成都的杜甫草堂，我想在如此可紀念的詩聖故居之地，來和祖國的學人交流學習杜詩的心得，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因此便匆匆地訂了機票，飛回祖國到成都參加會議。當時加拿大的溫哥華正值繁花如錦之季，但我想草堂的春天一定更美，所以在飛機上還曾經口占絕句一首，說：「平生佳句總相親。杜老詩篇動鬼神。作別天涯花萬樹，歸來爲看草堂春。」就是帶着這樣興奮的心情，我來到了成都的杜甫草堂，也就是在這次草堂的杜甫學會中，我幸運地見到了夙所欽仰的《詩詞散論》的作者前輩學人繆彥威先生。這對我而言，當然是一種意外的驚喜。記得當有人把我介紹給繆先生時，我所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早年讀過您寫的《詩詞散論》，這本書對我有很大的啓發。」而恰好在不久之前，繆先生也讀到了國內刊行的我的一本《迎陵論詞叢稿》，因此，繆先生對我所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也讀過你的《論詞叢稿》，你的意見與我很接近。」其後在大會中，我曾提出了有關杜甫七律之演進的報告，並言及我在海外每讀杜甫《秋興》中「每依北斗望京華」之句，輒不禁深懷故國之思，七七年返國，曾寫有「天涯常感少陵詩。北斗京華有夢思。今日我來真自喜，還鄉值此中興時」之絕句。先生對我的報告及詩作，亦頗爲稱賞。當時先生因目疾才動過手術不久，視力受損，行動皆依賴其孫男元朗扶持左右，且大會日程甚爲緊張，上、下午皆有會議及討論，我雖然因僥幸得遇

久所仰慕之前輩學人而欣幸無已，然而却因爲恐怕先生過於勞累，故除在會場中聆聽先生之談話及討論以外，並不敢向先生多所請益。豈意先生嘉賞後學，自相遇之次日起，即每日在中午休息時間，令其孫男元朗邀我前往談講詩詞，我時或妄言已見，先生亦每加以獎許。而先生在終日討論及開會之後，更利用晚間餘暇，不顧目疾視力之損，先後爲我書寫舊作詩詞橫幅二紙，且以舊著多種相贈，臨別之日，又書贈七言律詩一首，詩云：「相逢傾蓋許知音，談藝清齋意萬尋。錦里草堂朝聖日，京華北斗望鄉心。詞方漱玉多英氣，志慕班昭託素襟。一曲騷歌芳草遠，淒涼天際又輕陰。」詩中對我之獎飾，我雖然愧不敢承，然而先生之以「知音」見許以及惜別之情，則使我甚爲感動。大會結束後，我會隨與會諸人士至江油縣參觀李白故居，先生以目疾行動不便，故爾未曾參加。兩日之後，我始重返成都。翌晨臨上飛機前，特趨謁先生住所辭行，則先生方伏案展紙，蓋已在草寫致我之書信矣。見我之來，先生甚爲欣喜，即將未寫完之信稿舉以相示，信中先生曾引汪容甫與劉端臨相知訂交之事以相擬比，云：「昔汪容甫與劉端臨聞名而思，既見而相許，不數日而遽別，離索之感，惓結於心。容甫與端臨書云：『誠使學業行誼表見於後世，而人得知其相觀而善之美，則百年易盡，而天地無窮，今日之交，乃非偶然，離別之故，又不足言也。』循誦斯言，聊自解慰，並願與左右共勉之。」又在信中提出合作之構想，云：「如蒙不棄，願相與合作，撰寫評論詩詞之書，庶幾如汪容甫所謂『使學業行誼表見於後世』，則尤所欣盼者矣。」夫以先生年輩之尊，學養之崇，而獎勵後學，殷拳若此，此種情誼，即

使在常人得之，亦將深爲感激，何況我自三十年前便已對先生久懷欽慕，其感激之情，當然更非言語可喻。因此，我在飛返加拿大的航程中，也就寫了一首七律送給先生，詩云：「稼軒空仰淵明菊，子美徒尊宋玉師。千古蕭條悲異代，幾人知賞得同時？縱然飄泊今將老，但得瞻依總未遲。爲有風人儀範在，天涯此後足懷思。」自茲而後，先生與我遂常有書信往來，論學評詩，相知益深。先生既與我共同擬定了合作研究的計劃，且經由四川大學向教育部提出了邀我至川大講學及合作研究之申請。本來我恰好自八一年暑期後有休假一年的機會，只不過因爲天津南開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也都已經早就有邀我去講學的安排，因此，直到一九八二年的四月中旬，當我把南開及北師大的課程都結束了以後，才有機會到成都來實踐繆先生邀我至川大講學及合作研究的計劃。我飛來川大時，隨身攜帶書籍不多，先生總是經常將自己的藏書提供給我作爲參考。除共同撰寫《靈谿詞說》以外，我在川大也講授唐宋詞，每於課前課後，常與先生互相討論交換論詞之意見。一般而言，我與先生的看法大體都極爲相近，先生每每稱許，以爲有「針芥之合」，其偶有不盡相同者，則我亦常是直言己見，先生也不以爲忤。先生治學之態度嚴肅而認真，我每有所作，無論詩稿、文稿，都必先呈先生閱讀，指點得失，斟酌損益，即便僅只一二字之更改，往往也使我獲益甚多。回想我自己半生飄泊，卅載天涯，進無師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我雖曾以極大之毅力，堅持讀書、寫作之事，然而每至深宵人靜，讀書有心得而無可告語，寫作有疑難而無可商略之時，亦難免不深懷孤寂之感；昔陶淵明有「欲言

無予和」之歎，每一讀之，未嘗不慨然自傷。而今以憂患餘生，何幸竟能得遇素所欽仰之前輩學人，而且對我之知賞愛勉諄懇備至如先生者，這實在是我平生中極大之幸事。昔陶淵明又有詩云：「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又曰：「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自抵川大後，一個半月以來，我因為與先生合作撰寫《靈谿詞說》，常相與討論，其間所獲得的切磋之益與相知之樂，都是述說不盡的。這對我而言，自然是一種極可珍貴的遇合。

其次，再就體例之創新而言。繆先生與我合寫的《靈谿詞說》這一本書，則將是把我國過去文學批評中所經常使用的幾種體式，擬圖各取其長而將之融匯成爲一體的一種新嘗試。我們合作的原則是，首先以個人讀詞的心得爲主，分別寫爲韻文形式之論詞絕句，內容將包括對於詞體特質之介紹，對於個別詞人之論評，對於單篇詞作之賞析，以及對於前人詞論之意見，先以絕句綜括所欲論述之要旨，然後再以散文作較爲詳細之說明。前一部份將具有詞話之簡明自由之特質，而出之以便於記誦之論詞絕句之韻文形式，後一部份則將具有近世詞論、詞說之論述與說理之性質。至於所論述之對象，則將自敦煌之曲子詞開始，歷晚唐、五代、兩宋、金、元、明迄於晚清之詞人及詞論爲止。在分別撰寫之次第上，最初將不受時代先後的拘限，然在最後合編寫定之時，則將依時代之先後爲編排之次第，使之同時也能具有一種「史」的性質。希望這本書既能因其各爲單篇獨立之絕句，而有眉目分明便於記誦之長處，同時也能使讀者透過這些單篇的絕句及說明之編排次第，而對於我國詞體

演進遞變之過程、內容及風格之多種特色以及重要之詞論，都能有一種縱覽的史觀及整體的印象。至於在撰寫和編定的過程中，則繆先生與我既將有個別的分工，也將有共同的合作。其單篇之論詞絕句及附加之說明文字雖將由各人分別撰寫，而在寫作之前、寫作之間與寫定之後，則將經常彼此討論，互相參酌修訂，以求其雖在分別撰寫之情形下，也仍能保持不重複、不矛盾之整體性與一致性。俟全部寫定之後，再將所有的單篇定稿共同加以有系統的整理編排以合爲一集。像這種編排的體例及合作的方式，我想不僅就繆先生與我而言，是一種新的嘗試，即使在古今中外的文學批評中，這也將是一種從來未曾有過的新嘗試。關於這種新嘗試之結果究竟如何，特別是我個人的評詞之見解與撰寫之能力，是否能完全符合前輩學人繆先生之標準和要求，現在雖然尙不可知，但我個人對於這種新嘗試在文學批評體式方面之得失利弊，却也頗有自己的一點看法和感想，下面我就將把我個人的意見略加敘述。

二

就我個人過去讀書及寫作之經驗而言，我之學寫舊體詩詞及閱讀古人之詩話、詞話與論詩、論詞之絕句，都遠在我自己撰寫評賞詩詞之論文以前甚久。當我早年閱讀古人詩詞時，雖偶或也會用

韻文形式寫過一些讀詩有得之類的絕句之作，可是當我自己開始正式撰寫評賞詩詞之作品時，却一直總是採取長篇論文的形式，而從來不曾採用過韻文形式或詩話、詞話之形式。然而可注意的一點，則是我的長篇論文也往往喜歡採用古人論詩絕句或詩話、詞話之精義爲論說之依據，而且有時也偶在論文的篇末綴以自己的小詩以爲論說的結尾。卽如我曾採用元好問論詩絕句中之「豪華落盡見真淳」一句詩，來做爲評析陶淵明之詩與人的依據，也曾採用元氏論詩絕句中「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一首詩，來作爲比較謝靈運與柳宗元兩人風格異同的依據，更曾在評說李商隱之《燕臺四首》的一篇長文之末，鈔錄了我自己的《讀義山詩》一首絕句來作爲論說的總結。至於我在說詞的論文中之喜歡引用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則更是衆所共見的事實。由這些例證都可以看出，我一方面雖不肯採用韻文絕句或詩話、詞話之形式來寫作正式評論詩詞的文字，但在另一方面却隱然對這些古老的文學批評形式，也仍然有着深厚的喜愛。這種矛盾的現象，就正好說明了我對這些批評形式，原是認爲其既有所長之一面，也有所短之一面的。關於我的這些看法，過去我在自己所寫的一些論文中，已曾有過詳細的討論，茲不復贅。（可參看拙著《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第二編第一章之《緒論》與第三章之《餘論》，及拙著《中國古典詩歌評論集》中之《關於評說中國舊詩的幾個問題》一文，二者皆爲香港中華書局出版，前者出版於一九八〇年，後者出版於一九七七年。二書最近由廣東人民出版社重印。）總之，一般而言，中國這些古老的批評形式乃是精鍊有餘而詳明不足，有

籠統的概念而缺乏精密的分析，偏重形式方面的文字之美，而忽略邏輯之思辨，有兼容並蓄、得心應手之妙，而難免駁雜瑣細、良窳莫辨之譏，有時雖可以探觸到詩歌中真正感發之生命，而却不能將此種感受作理念明晰之說明。具有「會心」的讀者，雖然可以自此類文學批評中獲致共鳴的欣喜，並且可享有吟誦玩味之樂，然而對於初學之未具「會心」的讀者而言，有時就不免會產生一種對之莫測高深的困惑。我自己對於這一類批評形式雖亦知其所長，但也知其所短。因此，當我自己撰寫批評文字時，便不肯再採用這一類的批評形式。同時，我認為就今日文學批評發展之趨勢而言，一則，我們既應當汲取西方文學批評中長於思辨之精密之理論體系，以彌補舊傳統中文學批評之所短；再則，我們也應當顧念到後學者之需要，把他們從面對舊批評所產生的困惑中解脫出來，為他們寫出詳細明白的解說和批評。因此，當我自己撰寫評說詩詞的作品時，便常是採取長篇論文的形式，而且總是反覆說明，叮嚀周至。所以當繆先生開始一提出願與我共同撰寫論詞之作時，我雖然也曾滿懷欣幸喜悅之情，但當先生又提出將以論詞絕句之形式來撰寫時，我便不免一度產生了遲疑惶惑之感，不過我畢竟接受了先生的提議，而且在撰寫中也充滿了對於這種新嘗試的欣奮和愉悅，這其間，在我的思想中，也曾有一段轉變的過程。

在這種轉變中，我應該首先述及的就是繆先生對我的鼓勵和勸導。本來當先生最初提議我們的合作將採用論詞絕句之形式時，我一度曾經推辭說，我向來未曾寫過論詩、論詞的絕句，恐怕寫不

好，而且我以為絕句之形式較宜於寫景抒情，而並不適於論評說理，何況時代不同，一般人讀書、寫作，甚至於思想之方式，都已經與舊日的讀書人有了很大的不同，在今日寫文學評論的文字，而仍採用論詞絕句之形式，是否合於一般讀者的需要，我對此也頗有疑問。先生對於我的推辭和猶疑，首先加以鼓勵，說我平日既然常寫舊詩，對絕句之形式極為熟悉，而另外在我的論文中也有不少評論詩詞之精義，如此，則以絕句之形式抒寫論詞之意見，便也一定可以做得好；又說，我們的每首論詞絕句之後，都將附以散文的說明，如此則絕句部份，可以收提要鉤玄便於記誦之效，而散文部份則仍可以作明白曉暢之評說。聽了先生的話以後，我對於自己使用這種新體式的能力雖然仍無把握，但也覺得先生的話甚為有理，就同意了先生的提議。而與此同時，還有屬於我個人的另外一些因素，也使我認識到採用這種批評方式，可以有不少簡明方便的好處。原來兩年前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把我過去論詞的一些文字編輯在一起，出版過一冊《迦陵論詞叢稿》，因此，近來國內各大學便經常邀我去為同學講授唐、宋詞，講授的範圍始於晚唐、五代，迄南宋末期為止。在講授時，除注意個別詞人之風格特色以外，同時也注意到他們在繼承與開拓之間的關係及影響，其中有些作者，我對他們雖也頗有一些心得及意見，但在過去，却向來未曾寫過論文加以評說過；也有些作者，我過去雖會寫了論文加以評說過，但近來在講授之間，又增加了一些新的體會和意見，於是便有不少朋友勸我把未曾評說過的作者，分別加以評說，也有人勸我編寫一冊較詳細的詞史。但近年來我却一直忙於

往返國內外，在各地開會、講課，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可以寫成長篇的論文和專著，因此就想，如果採取這種以論詞絕句爲主而附加說明的方式，便可以先將自己的一些心得及意見，較爲精簡的記寫下來，如此，則他日如果有暇，便也可自此精簡之記敘，引申改寫爲長篇之論文或專著；如果無暇，則既已有此精簡之論詞絕句及說明，便也可以向一些對我寄以期望之友人及讀者們勉強報命。由於這種想法，便也更促進了我願意接受繆先生之提議，採用這種精簡之形式，與先生共同撰寫論詞專著之決心。在開始撰寫之後，我每草成關於任何一家之論詞絕句及說明，都必先錄呈先生過目，請求指正。先生則每每予以獎勉，以爲我雖是初次嘗試以絕句之形式寫爲論詞之作，然其所寫尙頗有可觀。這種勉勵，當然曾經使我在寫作中增加了不少信心；而同時在寫作之過程中，我自己對於這種新體式的嘗試，也產生了極大的興趣。我逐漸感到絕句之形式，雖然本來只宜於寫景抒情，而並不適合於說理，然而用這種形式來寫論詞的意見，却也仍然大有可爲。因爲詞之爲體，原來既最富於精美之意象，也最易於喚起比興之聯想，所以對於詞之欣賞，本來就並不宜於只以理性做枯燥之說明，而更重在以感性觸發讀者之感受及聯想。何況在文學批評之傳統中，原來也早就存在着一些形象喻式的批評，卽如鍾嶸《詩品》之以「爛若舒錦」評潘岳之詩，以「披沙簡金」評陸機之詩，又引湯惠休論顏、謝異同之語，以爲「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采鑲金」，以迄於晚清王國維《人間詞話》之以「畫屏金鷓鴣」評溫庭筠之詞，以「絃上黃鸝語」評韋莊之詞，便都是此類形象喻式之批評的最好例證。

因此，在論詞之絕句中，如果能避免此種體式之不適於論說的短處，不以絕句做不完整的說理，而嘗試掌握此種體式之適於具象之描寫及感性之傳達的長處，以象喻式批評的直感，結合上絕句之宜於唱歎的富於感發的口吻，便自然可以由所標舉之意象及敍寫之口吻中，傳達出一種批評及欣賞的意見和感受。當然，我們也仍然不得不承認，此種批評體式畢竟有其詳明不足和容易流為駁雜瑣細缺乏完整之體系的缺點。因此，在每一首論詞絕句之後，我們便都將各附加一段散文的說明，以彌補其詳明不足的缺點，而且嘗試要在最後編訂時，使之能具有一種「史」的性質，以彌補其駁雜而缺乏完整體系之缺點。這種撰寫計劃，可以說是想要把詩與文、創作與批評、舊傳統與新論說，都融為一體的一種新嘗試。至於論詞絕句之體式，是否可以編寫為具有「詞史」性質的專著，我個人對此也有一點自己的想法。本來一般而言，凡是「史」的編寫，都更偏重於發展演進之過程，更適於用散文來敍寫，而不適於用絕句來表現。蓋因絕句之篇幅過於短小，且有格律之限制，如果只用以傳達對某一位作者，或某一篇作品之印象及感受，則這種體式尚有可資利用之長處，但如果要之以從事於「史」的敍寫，則此種「絕句」之體式，就彌見其所短了。因為「史」的發展是屬於一種綫的性質，而短小之絕句則是屬於一種點的性質，二者之不同，固屬顯然可見。不過，如果我們能將分別之個點，按其發展之方向加以有次序之排列，則其結果也可以形成一種綫的概念。而且如果我們能對每一點的個體的趨向，都以說明文字加以提示，則我們最後之所見，便可以除了綫的概念以外，更見到此綫之